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推动文艺大众化

□ 邱华林 陆京城

瞿秋白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899年1月，他出生于江苏常州。1922年入党。1930年来到上海，和鲁迅并肩作战，结下深厚友谊，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瑞金，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兼管教育部所属艺术局的工作。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斗争，1935年春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同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在中央苏区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极力倡导文艺大众化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斗争。

明确大众化的文艺方向

当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瞿秋白身兼多职，又身患肺病，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克服种种困难，拖着病体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一段时间之后，瞿秋白在调查中发现，红色戏剧运动虽已经开展起来，但从当时的革命形势来看，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文章从哪里做起呢？他认为方向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能模棱两可，要旗帜鲜明。于是，他从明确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入手，对工农剧社提出“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提议以“高尔基”命名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将“蓝衫剧团学校”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瞿秋白认为，“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为方便戏剧学校的学员理解和接受什么是为大众的文艺，瞿秋白还向他们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作品《下层》，他认为这些“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

文艺方向明确后，如何确保方向不偏离？瞿秋白认为，制度是很重要的。1934年2月至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瞿秋白、徐特立的主持下，在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迅速起草拟定了24种教育规章，其中包括《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俱乐部纲要》《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一系列文艺法规。这些法规的出台，规定了各个文艺组织的方针、任

务和原则，为中央苏区戏剧运动真正走向大众、走进人民群众的心坎里，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艺术提供了制度保障。

办好大众化的戏剧学校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动员群众工作的扩大，中央苏区急需文艺创作的人才。为加强人才培养，瞿秋白十分重视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建设。在当时苏区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建专门的艺术学校非常困难。没有校舍，他就在瑞金叶坪找了一个破旧的祠堂略加修缮作为校舍，还修建一个室内剧场。一些同志不适应校舍的艰苦环境，时间一长，就丧失了奋斗的动力。瞿秋白了解情况后，就耐心做起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他鼓励大家说，路是走出来的，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不要性急。

除了校舍，最令瞿秋白头疼的还是教员太少。为了保证学校教学活动有序开展，他挨个动员中央苏区党政军高级干部，如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沙可夫、保卫局局长钱壮飞、保卫局侦察部部长胡底、工农剧社社长洪水等热爱戏剧艺术的人担任兼职教员。他也经常亲自到学校讲课，还大胆起用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中擅长导演、舞台装置和美术的人，请他们来当教员。可是，同学们不愿意当被俘军官的学生，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得知后，亲自来到学校与同学们座谈，苦口婆心地说：“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替红军做事，你们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你们天天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了没有？”学生们答道：“没有。”瞿秋白的一席话讲明了学习的重要性，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于是同学们不再歧视被俘的军官教员，开始认真学习戏剧艺术。

此外，瞿秋白还亲自参加教学计划的讨论，他认为生活是最好的老师，“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并提出：学校要附设剧团，战时经常到火线上巡回表演，鼓舞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并注意搜集创作材料，保持



同群众密切的联系。在具体办学实践中，瞿秋白认为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部队培养艺术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意义。他主张高尔基戏剧学校除开设普通班外，还应增设“红军班”和“地方班”，并把一些参加过苏维埃革命斗争的农村青年、红军中年轻的战士和各县区根据地工农剧社的社长抽调到戏剧学校培训半年，使红军和各县区都有一支懂得戏剧的文艺骨干队伍。

在瞿秋白的倡导和推动下，高尔基戏剧学校逐步走上了正轨，短短半年的时间，就为部队和地方培育了1000多名学生，锻造了一支支鼓舞和激励苏区军民英勇斗争的宣传骨干队伍。

倡导大众化的文艺演出

随着革命事业的深入，文艺活动需求量大增，地方苏维埃剧团面临剧本供应不足、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如何又好又快地发展文艺事业摆在了瞿秋白面前。他从苏区实际出发，既鼓励大家采取灵活方式进行创作，又严格规定剧本创作程序，提高了演出质量。

瞿秋白非常了解剧团演员的情况，知道他们大部分是参加过土地革命的农村青年，文化水平普遍低，有的甚至不识字，让他们独立创作剧本比较难。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他提出“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搞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好的东西记

录下来”。创作没有素材和灵感，他就鼓励剧社演员深入群众生活，与老百姓交朋友，甚至提出让群众参与集体创作，这样不但能多产生剧本，同时能很快提高每个同志写剧本的水平。

剧本数量有了保证之后，瞿秋白开始思考如何提高剧本质量。他亲自拟定剧本审查和预演制度，规定每个剧本、舞剧需先交由戏剧委员会讨论、提出关于“大众化、通俗化”的修改意见，然后经他最后审查，再通过预演以观效果。瞿秋白认为学会运用群众语言是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体现。例如他在讨论话剧《无论如何要胜利》时指出：“要用活人口头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一定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喜欢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的重要条件。”

1934年，中央苏维埃剧团到瑞金、会昌等中央苏区核心区域进行春耕巡回表演期间，采用集体创作方式，创作表演了《奸商富农破坏苏维埃经济》《富农婆压迫和毒打童养媳》《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惰二嫂不努力耕田》等反映当地群众革命生活的戏剧和活报剧，深受群众欢迎。除了表演，剧团演员还深入群众生活，与群众一起耕田、打柴、挑水、晒红薯干、收藏粮食，在学中演、在演中学，大大提高了戏剧创作效率和演出效果，一个月就创作出8个活报剧和3出戏剧，比过去剧社编委会数月创作的作品还要多、还要好。

瞿秋白领导推动的文艺大众化各项举措，成绩是显著的，对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丰富苏区军民的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1939年萧三到延安后，有一次毛泽东与他谈起牺牲的瞿秋白时，无限惋惜地说：“瞿秋白如果还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齐鲁文化中蕴含的宝贵精神价值

□ 高浩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山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期间，多次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指示。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理解齐鲁文化中蕴含的宝贵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有利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更好地助力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山东是中华文化长河的重要源头之一，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脉相承，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百家争鸣。这里是中华文化版图的巍然高地，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孙子圣贤辈出，书圣、算圣、医圣、农圣、工圣智者云集，董仲舒、王羲之、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等历史文化名人群星璀璨。齐鲁文化蕴含的许多宝贵的价值理念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为政以德”“仁民爱物”的治理观念。“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曾以“修己以安百姓”为最高境界。战国时期，面对想要大兴刀兵的梁惠王，孟子阻止道：“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夫谁与王敌”。其意为只有对百姓施行仁政，轻刑薄税，才能不战而胜，体现了鲜明的“德治”理念，也是其“民贵君轻”理念在国家治理中的体现。儒家认为，统治者的德行具有示范教化和导向引领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统治者若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就能“上行下效”，从而治理好国家。除了儒家之外，齐鲁文化其他不少学派同样强调“仁民”“爱物”，如管仲、晏婴主张为政应利民、富民，顺应民心，因民之俗，从民之欲。管仲认为“仓粟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提出“民富则易治”的观点，即百姓富足了，就会遵礼守义，畏刑惧罚，容易治理。管仲在齐国为官期间，着力推进各项重大改革，尤其重视经济发展，提高百姓物质生活。墨家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制定并施行对国家、百姓有利的政策，废止于国于民有害的弊政。

“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责任担当。忧国忧民、家国天下是齐鲁文化诸多学派的一个突出特点。“此务为治者也”，司马迁曾这样评价包括儒家、墨家在内的“六家”，强调这些学术流派致力于实现天下安宁。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主张实行王道仁政，倡导“内圣外王”人格修为和治国之道，逐步形成儒家“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价值追求，实现了个人人格修为和家国责任担当的有机结合。孟子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即是劝诫统治者只有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对待天下百姓的“忧乐”，才能使天下归服。与孔孟侧重于更为宏观的价值观思辨相比，管仲的观念更加具体化，侧重于实践的应用。管仲对齐国的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他的一些为政观点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齐鲁文化中“修齐治平”的责任担当虽经千年而不衰，经磨砺而精进，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由此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情怀因其而流传；舍生取义的仁者境界，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历久而弥新；“知行合一”“明理致用”“笃行践履”的务实精神经久而愈彰。

“革故鼎新”“刚健有为”的创新精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儒家历来推崇诗中所蕴含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展现了齐鲁文化的“精气神”，体现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创新性，是齐鲁文化生命力的源泉。管仲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提出“要者，王之本事也”，推动“均地分力”“相地衰征”“作内政而寄军令”等改革；提出“无市则民乏矣”，大力推动商业发展，还率先推行了盐铁专营制度。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打破了分封世袭制，为封建社会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墨子是极富创造精神的“科学家”，他在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领域都进行了卓越的科学探索。在当时齐鲁文化其他一些学派眼中，儒家学派相对保守，但是不断进取、有所作为仍然是其重要特质。孔子主张积极入世，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游走于各国之间，被人讥讽，但他并没有退缩，有人劝他放弃，他以“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十里不同音，方言倚着家乡的烟火氛围，腔儿调儿词儿味儿都充满了魅力。有的人会感到有点“土”，但对于常年在外工作的人来说，听到“土得掉渣”的家乡话，却是那样的亲切。

自小在家乡长大的我，已深深烙上乡土的印记。20多年因工作辗转多地，不管普通话在外说得多么标准，一旦与家人通电话，那家乡的土话不自觉就脱口而出，说着格外顺口，听着也极为顺耳。

我的家乡菏泽地处山东西南部。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在这里渔猎耕种、繁衍生息。尧、舜、禹等氏族部落首领的美好故事至今代代传颂。菏泽还是古代著名军事家孙臆、农学家氾胜之、理财家刘晏、文学家温子升等大批圣贤的故乡。而刘邦登基称帝、黄巢率众起义、宋江聚义传说等，一幕幕历史剧曾在这里风云汇聚，更是给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大气和传奇。

菏泽地处鲁豫苏皖四省交界，属北方方言体系，与河南话较为相近，但也自有特点，带着浓烈的本土印记。菏泽市鄄城县素有“好汉之乡”的美誉，菏泽人天生豪放、耿直，语言表达也就更直接明快。比如，第一人称“我”“我们”，第二人称“你”“你们”，皆可以用“俺”“恁”“咱”来代替。对小孩的称呼更是如此，比如，大人对小男孩叫“小”，对小女孩叫“妮”，这样叫起来不但简洁而更显亲昵。不管是疑问，还是设问，都可以用“啥”“咋”来表达。回答别人更是用“管”或“中”，一个字解决问题。

菏泽地处黄河平原，人们世代辛勤耕种在这片土地上，在“土坑”里创生活，对身边熟悉的动物都有独特的称谓。比如麻雀叫“小小虫”，大概认为麻雀是鸟雀中个头最小的吧。“独老龟”说的是未变成蝶的幼虫，蝶叫作“爬叉”，细长的蛇被叫作“长虫”，还有螳螂叫“刀老”、壁虎叫“蝎虎的”、蚜虫叫“腻虫的”、猫头鹰叫“夜猫的”，喜鹊叫“玛嘎的”等等。这些形象生动的叫法就好像给自己孩子起的“乳名”。

生活中的许多事物菏泽人也有自己的叫法。比如被称为盖在身上叫“盖体”，褥子铺在身下叫“铺体”，男衬衣经常被汗湿透叫“汗褂子”，你看形象不形象。早上叫“清起来”，傍晚叫“挨傍晚”，还有下雨时更有味道。刚下雨叫“滴点儿”，雨停了叫“住点儿”，下的如果是毛毛雨，就叫“雾细”，非常的形象、生动。如果雨下大了，叫“下紧了”。《水浒传》有一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文中有一句描写天气，“那雪下得正紧”。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认为一个“紧”字“境界全

闲话老家方言

□ 贾朝星

出”，鲁迅也感到这个“紧”字富有神韵。殊不知，这个“紧”字，在菏泽人口中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语，没啥稀罕的。

方言在家乡人听来是亲切的，但外乡人要听懂，有时还有一定难度，理解不了还会闹出笑话。记得有一年我们几个战友结伴回家探亲，下火车时发现少了一人，大家正着急时，车上有位热心的老乡大喊：“这里废了一个。”一旁的老乡都一脸惊奇。我听了会心一笑，估计这老兄睡着了。菏泽方言说“睡觉”发音“废觉”，所以有此误会。此外，诸如“水”发音“飞”、“说”发音“佛”、“书”发音“福”等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了一方方言。离家在外，难免在语言上入乡随俗，但无论隔多久，只要一踏上家乡的土地，“乡音”的记忆便会被瞬间唤醒，因为我们的“根”在那里。方言，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更是家乡人难以割舍的情结。它告诉我们自己来自何方，也提醒我们要记住深埋自己祖辈的那方土地。



实守信也是儒家德育重要思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认为取信于百姓对于治国同样重要，一国可以“去食”“去兵”，唯独不能“去信”。齐鲁文化把诚信看作日常行为的准则，管仲提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认为诚信是团结天下的纽带，是工商兴盛繁荣的关键。“孝悌忠信”侧重于人们内化于心的道德修养，礼义廉耻是人们外化于行的处世准则。管仲对此深有洞见，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之中礼是关键，既是国家层面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层面行为规范的核心。左丘明在《左传》中提出，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孔子告诫弟子“不学礼，无以立”，要做一个“文之以礼乐”的君子。

齐鲁文化蕴含的优秀价值理念还有很多，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准则，“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处世观念，“诚意正心”“三省吾身”的修身之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人格等，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深入挖掘并传承弘扬齐鲁文化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